

数字新闻学是什么：全球脉络与中西比较

常 江¹，黄文森²

摘 要 本文对 2020—2024 年间发表于中英文权威学术期刊的 575 篇数字新闻学研究文献的元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和系统性综述，旨在从研究议题、理论概念、方法取向和跨学科视角等维度，对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和演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摹刻，并在中西比较视野下阐释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的学术策略与在地实践。研究认为，过去五年间，全球数字新闻学在国家多样性、跨学科多样性和议题多样性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体现出旺盛的理论活力；与此同时，“中心—边缘”的知识生产结构依然牢固，欧美经验显著影响着该领域学科视野的转换与研究议题的集中化；与欧美相比，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理论显现出思辨色彩和知识体系重组的理论自觉，并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前提与问题域；中国的数字新闻学尽管积累了丰富的规范性观念资源，但在方法论上的实证逻辑和科学性仍有待提升。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新闻理论；中西比较；知识体系

DOI:10.26599/GJMS.2025.9330004

一、历史的回望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总是源于新闻观念与实践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回应与适配，在时间线程上大致形成了规范主义（20 世纪初）、实证主义（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媒介社会学（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和全球比较（20 世纪 90 年代）的范式演化趋势（Steensen & Ahva, 2014）。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问世为标志，“在线新闻”（online news）的早期形态开启了新闻数字化的历史进程，自此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开始全面改造新闻实践及其认知活动。媒介理论借由技术迭代进行实践史分期的传统，为新闻学新范式——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DJS）的发生创造了认识论前提，推动新闻学进入以“数字性”为主导力量培育新闻的形式与行动、“再造”新

1. 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2. 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 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 ·

闻业的历史与道德传统的新阶段。

除了技术创新的推动之外, 关键的社会—政治事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数字新闻的实践形态和数字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从很多方面看, 2024 年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间节点。回望过去五年(2020—2024 年), 我们得以大致锚定那些改变新闻实践与生态的“关键事件”: 2020 年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起点, 2021 年美国政府的选举更迭对全球民粹主义思潮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延宕至今, 2023 年巴以冲突的加剧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隐患, 2024 年是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重要选举的“超级大选年”……所有这一切, 都使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变得日益扑朔迷离, 新闻业被裹挟其中, 艰难地应对着历史变局。期间, 更有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 其在全球范围掀起的自动化(automation)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全球文化的规则与标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与更迭。

基于此, 索斯滕·科万特(Thorsten Quandt)基于个人经验将过去 25 年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进一步细分为四个阶段, 即定位(niche)、狂喜(euphoria)、幻灭(disillusionment)以及前景黯淡(doom and gloom)。在他看来, 我们此刻正处于对这个新兴领域经历期待与彷徨之后的“悲观主义”时期。由于习惯性因循欧洲语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惯性, 全球数字新闻学的总体立场过于消极——“它或多或少陷入了对网络世界沮丧的现实和对数字新闻作为民主救世主的破碎承诺的哀叹之中”(Quandt, 2024), 以至于选择性地忽略了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新闻创新行动及认知实践。

那么, 经过二十余年概念化、理论化和学科化的范式耕耘, 全球数字新闻学的研究旨趣如今呈现出怎样的学科和议题分布? 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和方法路径有何差异? 这些差异对于我们发展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学范式又有何启发? 为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对过去五年内中英文语境下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文献元数据进行内容分析和系统性综述, 旨在从研究议题、理论概念、方法取向和跨学科视角等维度, 对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和新近发展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摹刻, 并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检视中国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化趋势和在地化知识生产特色, 为本土学界继续构建“本土经验、全球视野”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二、数字新闻学的研究现状

(一) 数字新闻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样性

自从“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中西方学术界开

始流通以来,国内外学者通过专题评论、研究综述或文献计量学等方式对不同时间跨度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文本进行了一系列阶段性回顾。例如,为了把握数字时代新闻学的概念化和跨学科理论化趋势,有研究者对《新闻学》(*Journalism*)和《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两本新闻学英文刊物2000年至2013年期间刊发论文的关键词和摘要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新闻学研究的主导性学科视角呈现出从政治学逐渐向社会学过渡的趋势,其中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如伦理和客观性)更多地社会学框架下被考察,比如对专业性的研究;同时,来自技术和经济学的新方法也正在进入新闻学研究,但其影响仍然较为有限;在方法上,新闻学研究出现从经验主义到理论意识的转变,定性分析仍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Steensen & Ahva, 2014)。

2013年,《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的创刊为该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研究开辟了重要的阵地,尤其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和跨学科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传统社会科学仍然对研究活动具有显著的引领性,学术共同体“惯性地”遵循社会学框架,将新闻首要把握为“机构”和“职业”,归纳形塑新闻的各种力量(如新闻惯例、传播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并开始基于对人—技关系的考察来推动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新闻学的理论话语也呈现出鲜明的“技术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系统性采纳行动者网络(ANT)和科学技术研究(STS)这样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视角来重新阐释新闻现象,来自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等学科的观念资源也逐渐在新闻学理论中显现出来(Steensen et al., 2019)。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数字新闻学研究所涉学科视角的多样性仍局限于对新闻本体的解释,新闻向哲学、文化、历史、语言和法律等领域的拓展研究仍很不成熟。

此外,还有学者对2013年到2021年期间发表于《数字新闻学》《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等五本国际新闻学研究期刊上的3068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从作者和研究议题方面对“多样性”进行具体分析,发现数字新闻学研究者的国际多样性呈稳步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作者层面,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英语国家以及德国和荷兰两个西欧国家的研究者发表了超过60%的论文;在研究议题上,国家多样性指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与美国相关的案例研究占绝大多数(69.5%),而这种美国中心主义(US-centrism)趋向在《数字新闻学》中尤为明显,该刊中与美国相关的案例研究占比达到76%(Zeng & Chan, 2023)。这种国际学术话语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后果就是数字新闻学研究议程的狭隘化——现有研究过度聚焦欧美私营新闻业典型的收入及分发模式转变趋势,重视用户数据和受众分析,并高度关注虚假信息与媒体信任等问题(Steensen &

Westlund, 2021)。这些问题在一些非欧美语境下或许并不是最核心或最紧迫的。

既然多样性成为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旨”,那么近年来动荡的国际社会局势和全球经济的再全球化趋势,在改变新闻行业实践的同时,是否也影响着数字新闻研究的多样性?本研究将基于文献数据首先回应以下两个问题:

研究问题一:在过去的五年里,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研究者国别、跨学科视角和研究议题分布情况如何?

研究问题二: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研究取向有何特征?

(二) 数字新闻学的中西差异

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的发展与欧美语境有显著的不同,体现出鲜明的规范理论色彩和哲理化特征。过去五年间,中国学者对数字新闻学基本概念、认识论以及规范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在观念和价值层面上鲜明地表现出知识体系建设的意图和主动性。在数字时代,经典新闻学理论体系受到数字化历史进程的挑战,数字新闻与传统新闻在实践属性、要素构成以及文化标准等方面兼具差异性和价值互通性,而历史与比较的跨文化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观念丰富的内部纹理与阐释层次。由于全球新闻业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并不均衡,欧美经验始终是中国研究者对数字新闻进行理论化的重要外部资源,比较的基因一直存在于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的构成之中。研究者在中外经验的相互观照之中考察传统新闻学核心理念(真实、客观、民主)在数字时代的“再造”与“创新”,形成了建构主义与人本主义交汇、杂糅的独特理论成长路径(舒德森、安德森,2022)。当然,这种依赖欧美“前沿”经验的理论化工作究竟应当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学界仍须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

在既有的经验层面,中西方新闻学由于历史传统和学科地位的不同,在知识生产方式和理论体系演进上遵循着不尽相同的逻辑。例如,有研究者基于诠释学的分析传统,讨论了“技术”作为关键概念在中国官方话语中的表述及其对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价值,认为中国数字新闻学与国家新闻元话语关系密切,并因此深度关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辩证法和技术领导权等主要议题,同时关注本土文化传统及政治语境的影响(梁君健、杜珂,2022)。

此外,本文作者还曾对2011年至2020年十年间90本中英文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刊登的10000多篇新闻学研究论文进行了量化统计,并在历史纵向和中西横向的维度上,比较了数字时代中外新闻学研究理论发展路径的差异性:(1)相较于西方新闻学对极个别学科的倚重(如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国新闻学学科理论来源多样性程度更高,而且理论视野更偏向于人文学科(以历史学、哲

学和语言学为主);(2)相较于西方新闻学“重理论、重方法、重解释”的研究特征,中国新闻学的理论意识体现了主导性意识形态对新闻创新形态和基本观念的影响,并且培育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本土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3)从理论化程度来看,在英文书写的新闻学论文摘要中,1/3的研究明确使用了特定的理论或概念(如选择性接触、知识沟、社会资本等),而这一占比在中文摘要中不足1/7(常江、黄文森,2021)。

就观察的连续性而言,本文是对2021年所做上述综述性研究的数据补充和视角延伸。在中西比较的维度上,为厘清数字新闻学研究不同的理论化特征和方法论路径,本文进一步提出两个新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 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研究分别侧重于哪些学科视角和研究议题?

研究问题四: 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取向有何不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近5年内(2020—2024)发表在99种中英文新闻传播学重要期刊上的共计575篇数字新闻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计量学和内容分析法对文献元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定性解读。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在中西方语境下比较中英文书写的数字新闻学研究文献。其中,中文论文以CSSCI来源期刊(2023—2024)目录中19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作为文献来源,通过中国知网(CNKI)分别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2日)并获取这些期刊2020至2024年所有发表论文文献元数据共计2.01万条,包括作者、标题、关键词、摘要和发表时间等字段信息。为了筛选数字新闻研究论文,以“数字新闻”为过滤词检索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并剔除卷首语、短评、对谈、书评、摄影等文章类型,最终获得185篇论文作为中文文献的分析单元。

对于英文论文,我们根据2024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分类下的80种(Q1、Q2区)期刊目录作为文献来源,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分别检索(检索时间为2024年11月2日)并获取2020至2024年期刊发表文献元数据共计约2.37万条,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作者、机构及地址等字段信息。同样,我们以“digital journalism”和“digital news”为限定词对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进行过滤、筛选,最终得到文献类型为“article”(不包括书评、编辑评论等)的研究论文记录390条,作为英文文献的分析单元。

(二) 数据处理

本研究分别对中英文论文摘要文本中所涉及的“学科视角^①”“研究议题”“理论显性”“使用理论”“研究方法”等五个类目进行人工编码和填写。三名经过编码培训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参与编码, 基于随机抽取的中英文样本(占各自全样本的10%)进行多轮培训和试验性编码, 直至在所有类目上的 Holsti 系数(即编码员一致性)均达到0.90以上, 编码员方可进行正式编码。

1. 学科视角

指的是研究摘要中体现的与研究对象(如体制、记者、新闻等)紧密关联的主导性学科, 我们在泽利泽(Zelizer, 2004)的新闻学关联学科的分类基础上增加了“心理学”, 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经济学、哲学、法学、技术和其他等11个类别。

2. 研究议题

涵盖新闻学研究对象和问题所关涉的主要领域和方向, 包括新闻产业、新闻实践/生产、新闻消费、新闻流通、新闻类型、新闻内容、新闻技术、新闻理论、新闻教育、新闻伦理法规和其他。

3. 理论显性

指的是摘要中体现理论使用的显要程度, 分为“有”(明确提及使用特定理论或模型)、“部分”(提及某些理论相关概念, 如“资本”“框架”等), 以及“无”(未提及任何理论或相关概念)。

4. 使用理论

该项为开放性问题, 如特定研究的“理论显性”选择“有”或“部分”, 则需要编码者根据摘要提示填写出理论名称或理论概念(如“框架理论”“新闻客观性”等), 以便于后续进一步归类。

5. 研究方法

指研究摘要中明确提及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呈现等环节涉及的方法手段或技术工具, 可分为定量方法(如抽样设计、问卷调查、实验法、内容分析、统计推断等)、定性方法(如深度访谈、民族志、德尔菲法、扎根理论、批评话语分析等)、计算方法(如文本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混合方法(同时使用定性/定量/计算方法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和无明显方法等五类。

四、研究发现

(一) 数字新闻研究的多样性

1. 国家多样性

通过统计作者供职机构所在国家,在 390 篇数字新闻学研究的英文论文中共有来自 52 个国家的 829 个(人次)署名作者^②。本文借鉴衡量生物群落多样性的辛普森指数(Simpson's diversity index)计算国家多样性,同时考虑到物种丰富度(本文中指不同国家的数量)和物种相对丰度(即每个国家的作者数量),该指数值域在 0 到 1 之间,越接近 1 表示多样性越大。根据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国家多样性程度为 0.842,比此前基于 5 本新闻学期刊(2013—2020)数据的丰富度为 64 个国家的情况多样性指标更高(Zeng & Chan, 2023),说明近 5 年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然而,从国家排名情况来看(参见表 1),位列前 15 位的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余主要是欧美国家,其中尤以美国学者的论文发表人次(292,35.22%)最多,与 Zeng & Chan(2023)对 2013 年至 2021 年间统计的占比一致(约占 38%),说明“欧美中心主义”乃至“美国中心主义”是描绘数字新闻学研究全球版图时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和认知前提。不过,重要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西班牙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非英语国家的重要性正在体现。尤其是西班牙,其数字化历史充满了变革与矛盾,其数字新闻生态系统近 30 年来实现了非凡的扩张,原因在于日益增长的在线新闻消费需求刺激了数字媒体(尤其是数字原生媒体)的大规模出现,使其占据了传统媒体被迫放弃的市场空间,从而在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 2008—2013)时期实现逆势生长(Salaverria & Martínez-Costa, 2024)。

表 1 英文论文作者数量排名前 15 的国家

排序	机构来源国	人数	比例
1	美国	292	35.22%
2	西班牙	123	14.84%
3	德国	53	6.39%
4	英国	42	5.07%
5	澳大利亚	29	3.50%
6	中国	28	3.38%
7	瑞士	25	3.02%
8	荷兰	23	2.77%
9	加拿大	16	1.93%

续表

排序	机构来源国	人数	比例
10	比利时	15	1.81%
11	奥地利	14	1.69%
12	巴西	14	1.69%
13	丹麦	13	1.57%
14	挪威	12	1.45%
15	瑞典	12	1.45%

与此同时, 中国的研究者也开始进入数字新闻研究领域, 并贡献了来自东方的文化视角和独特经验。例如, 在新闻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方面, 中国主流媒体的“国家创业模式”(state-preneurship model), 即由国家资助并主导新闻创新项目的过程, 超脱了大多数西方民主制度通过财政补贴、机构资助和风险投资驱动创新的经验范畴(Fang & Repnikova, 2022); 而在新闻样态创新上, 中国记者基于视频博客(J-vlog)的视觉化叙事塑造了“专业—业余”报道的混合形式, 扩展了现有关于数字新闻情感化及数字新闻透明性的辩论广度(Meng & Wang, 2025)。

此外, 过去 5 年中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学术话语及其对非西方数字新闻实践的讲述也十分引人注目。这类研究数量不多, 但却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例如, 菲律宾学者关心本国数字新闻工作者如何在技术颠覆、数字民粹主义、市场竞争加剧、劳动不稳定和政治压力中提升新闻专业能力(Estella, 2021); 巴基斯坦研究者讨论东非语境下数字新闻课程中的情境化教育策略, 旨在增强东非记者的多媒体制作技能, 帮助记者适应快速变化的职业和社会环境(Breit, 2020); 南非的研究者关注津巴布韦政变后数字新闻实践的形式, 如数字泄密新闻(leak journalism)、数字游击新闻(guerrilla journalism), 以及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的小型数字新闻平台, 这些另类形式使记者能够通过提供调查性新闻来对抗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压迫(Munoriyarwa & Chibuwe, 2022); 秘鲁的研究者则基于系统思维分析秘鲁、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混合型民主国家的独立新闻实践, 讨论其在信息质量、经济可持续性和促进受众积极参与之间保持平衡的策略(Marino-Jiménez et al., 2023)。

2. 跨学科多样性

根据图 1(a)可知, 国际数字新闻学研究以社会学(占比 28%)为主导性学科视角, 表明新闻生产者(包括新闻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工作惯例和互动, 以及影响他们工作的新闻组织、机构和结构(包括职业规范和价值)等议题依然是数字时代新闻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新兴新闻行动者及其与传统新闻工作者之间的边界协商正在定义“什么是数字新闻”——数字新闻被他们视为新闻业“一如往常”(business-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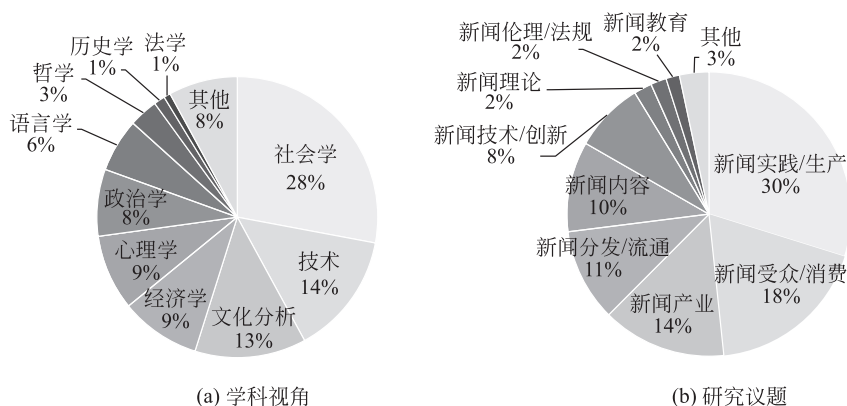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数字新闻研究的学科视角和研究议题分布

usual)的延续而非新闻业的一个子领域(Perreault & Ferrucci, 2020)。

数字新闻学研究中的技术视角(占比14%)从经典新闻学时期的边缘地位逐渐上升为中心视角(Steensen & Ahva, 2014),这说明技术作为关键非人类行动者对新闻业态和实践观念的影响日益彰显。其中,沉浸式新闻与暴力(Mañas-Viniegra et al., 2020)、数字直播技术中的新闻参与(Ilan, 2022)、“点击诱饵”新闻与算法策展(Lischka & Garz, 2023)、人工智能介入的事实核查新闻(Lelo, 2024)、数字新闻的物质及其基础设施(Sjøvaag et al., 2024)等主题引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第三个重要的学科视角是文化分析(13%),侧重于关注塑造新闻实践的情境性因素。例如,有研究者阐释“视觉公民”(visual citizen)的启发式概念以探讨新闻在日常中对“观看政治”(politics of seeing)的影响,并重新思考新闻报道中意象的生产及其之于公众生活的重要性(Allan & Peters, 2020);还有研究者(Ivanov, 2020)讨论了用于分析文化结构如何在组织实践背景下支持情境认知的方法,通过检查新闻编辑室档案工作者在选择存档新闻材料时所使用的评估技能来促进“实践中的理解”(understanding in practice)。

此外,其他的社会科学视角(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紧随其后。相较于前10年西方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整体情况,政治学视角从原来的第2位(占比28%,参见常江、黄文森,2021)下降至第6位,略低于心理学(9%)以及经济学(9%)类别。人文类学科视角(包括语言学、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研究均较少,分别占比6%、3%、1%和1%。

3. 研究议题多样性

如图1(b)所示,数字新闻学最重要的议题是“新闻实践/生产”(30%),其次是“新闻受众/消费”(18%)、“新闻产业”(14%)和“新闻分发/流通”(11%)。除

此之外,“新闻内容”(10%)、“新闻技术/创新”(8%)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议题,“新闻理论”“新闻伦理/法规”“新闻教育”等议题的研究则较少,占比均为2%。

作为第一大核心议题,“新闻实践/生产”反映了新闻学以编辑室为中心、以生产为中心的学术传统,它与社会学视角共同组成了新闻学的经验田野与理论资源,主要聚焦数字新闻机构的生产关系、角色实践和工作惯例,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形式、制度和结构(包括职业规范和价值)。与传统的生产逻辑不同,数字环境由非新闻媒体专有的平台主导,并形成涉及新闻出版商、平台所有者和用户的数字新闻空间。对此,有研究者从项目选择、时间性、层次结构、表达风格,以及对用户生成内容的态度等五个维度,理解新兴新闻空间中数字媒体的生产逻辑,以加深我们对新闻组织平台实践的认识(Tenenboim, 2023)。在此基础上,社交媒体编辑成为数字新闻编辑室的新角色,有研究者在场域理论下观察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逻辑之间挣扎,尽管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营销者,但他们仍努力通过社交媒体推销新闻(Opgenhaffen & Hendrickx, 2024)。而在编辑室内部,新闻工作者被要求掌握更多的数字技能(如计算机编程)以支持数字新闻产品开发,研究者通过实践理论讨论新闻编辑室中“写代码”的跨角色实践方式,并就编程的物质性与反身性发表见解(Royal & Kosterich, 2024)。

“新闻受众/消费”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第二大议题,这得益于该领域正在持续经历的“受众/用户转向”,该议题侧重于关注数字媒介受众/用户的新闻使用/消费的习惯、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例如,有研究检验了新闻用户的政治倾向和消费程度对15个数字新闻品牌的消费的预测效果,并着重考察了信任作为中介变量的解释机制(Moreno et al., 2020)。还有研究借鉴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指出受众在新闻消费时间和选择上更可能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而非新闻偏好的引导,例如在新冠疫情初期人们因为社交隔离和疫情信息需求而相较平时消费了更多的新闻(Nelson & Lewis, 2022)。此外,研究者还从新闻接触(González-Bailón & Xenos, 2023)和受众极化(Mangold & Scharkow, 2022)的测量方式、新闻回避(Lindell & Mikkelsen, 2023)的社会阶层差异,以及应对信息过剩的新闻定制(news tailoring)(Lor et al., 2023)策略等方向讨论数字新闻消费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分析维度。

第三个核心议题是“新闻产业”,主要探讨传统或数字新闻机构如何采用新方法维持其商业运营并保持竞争优势。例如,西班牙的慢新闻(slow journalism)媒体采用紧缩型的商业模型以坚持对内容品质、深度和可信度的追求(Agirre-Maiora et al., 2020);美国数字市场中的地方媒体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并吸引读者和广告商,专注于建立细分市场并促进原创报道,以确保其商业可持续性(Pantic, 2022);而澳大利亚的地方报纸尊重传统和声誉,扎根于地

方,并通过培养员工忠诚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传统报纸在数字时代的延续(McAdam & Hess, 2024)。

第四个核心议题“新闻分发/流通”则着重考察新闻编辑室之外的、媒介化的信息流动过程,以及承载新闻分发(或流通)过程的把关者或载体(如分发个人/机构、网络、平台、基础设施等)。新闻流通正在展现新闻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流通”(circulation)应被理解为信息传递的形式和生产关于新闻的共同意义的场所,包含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等核心要素,关切数字媒体的物质性、实践模式以及公众对新闻认知权力的争夺(Carlson, 2020)。例如,有研究者追踪社交媒体上跨国新闻链接的分享,以识别和刻画国内外受众社群的社交新闻媒体谱系(Rauchfleisch et al., 2020);有研究者追踪数字新闻机构所依赖的多种外部行动者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揭示行动者流动轨迹的政治同质性现象,及其背后独立于个人或组织的、由政治立场主导的媒介生态系统(Hagar et al., 2023);还有研究者基于维基百科和全球新闻报道采用一种多主体和多方向的网络架构,对多元媒体行动者网络去中心化的议程建构和设置能力进行理论化研究(Ren & Xu, 2024)。

综观上述四大核心议题,它们恰恰与前述斯滕森和韦斯特隆德(Steensen & Westlund, 2021)指出的数字新闻学的四大结构性前提(structural premises)形成了对应关系,其中对信息操作和媒体信任的讨论属于“新闻实践/生产”的范畴,对用户数据和指标的测量是“新闻受众/消费”的热点话题,对收入模式和分发模式转变的关注则分别落在“新闻产业”和“新闻分发/流通”两个领域,侧面印证了以欧美经验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对数字新闻学问题域和认知对象的强大影响(Zeng & Chan, 2023)。然而,在该领域有限的国家多样性的基础上,西方学者认为重要的议题是否真的是全球性问题仍有待商榷。就收入模式而言,广告收入流向平台的趋势在非西方国家情境下不一定适用,比如中国媒体的组织创新更多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组织文化和重大事件的影响,而不完全是媒体技术、市场力量和受众消费的产物(Chan et al., 2024)。

(二) 数字新闻理论化的中西比较

1. 学科视角的差异

中国数字新闻实践相较于西方语境,存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技术背景的差异,其理论化逻辑和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在对比的框架下,图2展示了中英文书写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论文所采纳的学科视角分布情况。这里,我们使用香农的多样性指数(Shannon's diversity index,记为 H)计算学科分布的均匀程度, H 指数越大,学科视角多样性越丰富,且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布越均匀。经过计算,英文论文的学科视角(除了“其他”)多样性指数 H_e 为2.86,而中文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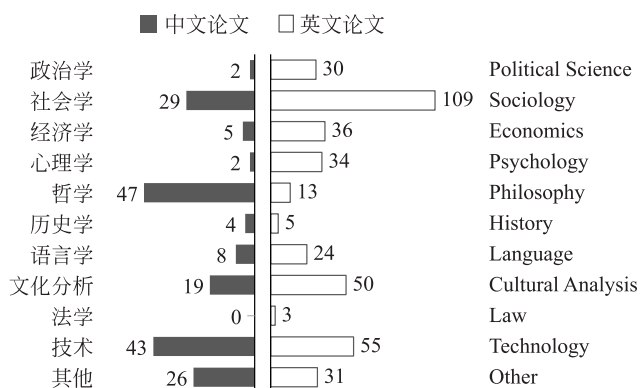


图2 中英文期刊数字新闻学论文学科视角分布及对比

的学科视角多样性指数 H_c 为 1.84。由此可见,中国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学科视角相较于西方而言呈现出更加异质性的特征;而且,与 2011 至 2020 年期间整个新闻学领域的学科分布($H = 3.06$, 参见常江、黄文森, 2021)相比,其多样性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学界主要在哲学(47 篇)、技术(43 篇)、社会学(29 篇)和文化分析(19 篇)四个学科视角下开展数字新闻学研究,这四个学科视角下的研究占比将近 75%。

此外,与西方视角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社会科学的“边缘化”趋势——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取向的研究数量不足 10 篇(占比 0.49%)。不过,与主流新闻学领域前十年的数据比,人文学科如语言学(8 篇)、历史学(4 篇)的比例也大幅下降。尤其是在经典新闻学时期处于优势地位的新闻史学,面对正在酝酿之中的新范式“难为无米之炊”,仅有寥寥数篇论文在文艺史(向芬、余越, 2024)、技术史(黄文森、常江, 2024)和概念史(彭剑、江浩, 2023; 黄雅兰, 2024)的广义史学视角下探讨数字新闻的样态创新和学术概念演变。

与欧美数字新闻学界对社会学视角的青睐不同,哲学视角是中国学者切入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导性框架,强调数字新闻的认识论、本体论及伦理等学科基础性问题。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张有: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当前技术与历史条件下的新范式,形成了“技术—文化共生论”的认识论基础,聚焦于新闻生态与新闻行动者两大研究范畴,同时包含以专业性为核心话语、以信息民主为价值目标的规范理论面向(常江, 2021)。

在生态研究范畴,研究者检查了可供性概念进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旅行轨迹,认为可供性概念具备理解和分析数字新闻业的认识论潜能,应将其作为生态性的认知概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特征(黄雅兰、罗雅琴, 2021)。在行动者研究范畴,数字新闻学在认识上发生“行动者转向”,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视为与记者、机构和阅听者等相关方同等重要的行动者,具有揭示新闻业与新技术

关系的强大解释力,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对其理论资源的调用(刘松吟,2024)。中国学者尤其注重对各种类型的智能技术类行动者的专门分析(庞华、张凯歌,2024),并尝试引入后人类主义视角加以阐释。在规范理论方面,研究者重新概念化“公共性为数字新闻业的价值”的合法性基石,主张在观念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实现对公共性价值理想实现路径的重建,这将有助于探索新的专业主义以及规划新的伦理体系(常江、刘璇,2021)。此外,也有研究者尝试将学界关于数字新闻规范理论的探讨应用于新闻业的治理实践,倡导以新闻真实和公共价值为前提,重视“参与透明度”的程序及机制建设,立足“可解释的、负责任的权衡”的治理方案(仇筠茜,2021)。

中西方学界基于技术视角的数字新闻研究,均密切关注了新兴数字技术形塑下的新闻样态和形式。例如,“容积新闻”通过数字建模构筑立体化新闻场景,让用户可以“步入”新闻现场“触摸”被摄对象(杨奇光、苏娟,2023);“可穿戴新闻”利用可穿戴技术提供可实时采集和传输的个体生命数据,使新闻内容可以是他人生命与生活体验的数字复制品(陈凯宁,2024)。然而,国内学者对技术的讨论更倾向于在科学技术研究视角下进行哲学和理论层面的探讨,以重新审视媒介的技术面向。例如,研究者主张分析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以及物质敏感性等问题,以揭示多元新闻主体共同生产的基础逻辑,并促进诠释社群形成随机且持续的社会技术想象(李玉媛、余文斌,2022)。还有学者检视“新闻物质性”与媒介物质性的理论关联,呼吁对新闻生产过程中“对象物”的系谱学考察,以建立社会、历史、文化和情感维度的新闻技术与权力批评(申爽,2024)。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社会学视角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个是“空间转向”,即一种将空间化思维和理论引入新闻学的研究偏向,强调将关系作为分析新闻空间的新面向(白红义、张恬,2021)。例如,研究者指出新闻生产的时空逻辑从“时间消灭空间”转向“空间压倒时间”,以数据新闻作品为案例考察数字新闻生产关系网所形成的空间样态,尝试理解数字新闻的建构逻辑与生产图景(肖燕雄、郭妍,2023);还有学者关注“网络化”新闻生产逻辑,归纳中国情境中数字新闻生产的协同网络类型——媒体主导型、节点动态型以及共享社区型,并分别依据专业价值、透明性与参与性以及专业知识规范展开新闻生产(徐笛等,2022)。第二个是数字新闻实践的“情感转向”,有学者从交往中介的角度理解新闻情感在公共领域中凝聚社会认同和建构情感规范的作用,主张数字新闻参与者建立具有凝聚性和联结性的情感规范,以维护公共空间良好的情感生态和新闻公共价值(赵家琦,2023);还有研究基于情感公众理论,讨论如何借助情感将网络公众的团结进程和连接行动纳入对情感社会的考察之中,并以一种非线性的、去组织化的方式理解用户新闻参与的实践规则与规律(田浩,2024)。

2. 研究议题的差异

在研究议题方面(见图3),中国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关切亦有别于前述欧美数字新闻学的四大议题,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和理论化思路。“新闻理论”(53篇,占比29%)、“新闻实践/生产”(41篇,占比22%)、“新闻技术/创新”(32篇,占比17%)三个核心议题引领了中国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议程,相关论文数量占比超过68%。这三个议题也恰恰反映了当前数字新闻学对传统新闻学体系实现范式性突破的重要面向:技术在新闻业态中日趋扮演生态性角色(技术/创新),数字新闻从业者呈现非专业化趋势(实践),基于情感网络的新闻业逐渐成型(生产),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成为新闻业的持续性危机(理论)(常江,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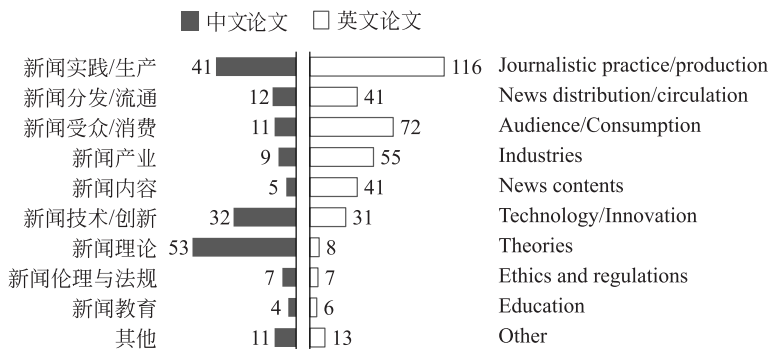


图3 中英文期刊数字新闻学论文研究议题分布及对比

为了与欧美中心主义的数字新闻学形成对话和比较,本文基于中文书写的研究文献将近五年来中国数字新闻学理论化的三个结构性前提及相关研究焦点归纳如下:

第一,数字技术正在生态意义上改变中国新闻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不仅是新闻实践的外部形态,更有其内在运转的逻辑和机理。例如,“Vlog新闻”的网络化和社交化基因赋予新闻以体验感和形式感,激发主流媒体对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重新审视(梁君健、杜珂,2022);数字新闻叙事在文本构成、核心语法和组织逻辑上均形成了新的结构,创造出模型化、共情式和协商性的媒介文化(何天平,2023);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业务、机制、专业、理念和职业定位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重构新闻生产流程,塑造出有别于过往的新理念与新结构(陈昌凤,2023)。

第二,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依据自身的特征对数字技术的生态性影响进行应对和调适,重塑了多元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和主体性,新的新闻行业标准和从业规范正在形成。例如,研究者认为,机器作为工具和渠道进入数字新闻

业并获得重要权力,但机器生产始终不能替代人的思维,而是需要与人的思维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彭兰,2022)。面对日益多元驳杂的实践者,开放生产成为数字新闻的核心实践特征,促使新闻生产网络中的介入者和纾困者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角色与价值定位(王晓培,2024)。在全球数据开源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开源赋予主流新闻生产合作、开放和共享等新特性,催生了更加透明和负责的新闻文化,有助于形成多元、敏捷和民主的新闻生态系统(张伦,2023)。

第三,在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的情况下,新闻业出现了价值极化或价值虚无的伦理危机,数字新闻学亟须对新闻业的民主和公共价值进行重申,对理论进行更新,甚至对体系进行重建。例如,“新闻权威”近年来成为数字新闻研究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专业/职业的文化权威,其核心在于理解数字新闻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李艳红,2024)。对此,有学者认为,新闻权威重建的要义是观照“人与物”的多元关系与和谐秩序,顺应数字新闻超越“专业信息系统”而泛化为一种“公共信息关系”的演进规律(常江、杨惠涵,2023)。新闻业观念与实践相互形塑,新闻透明性观念作为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规范观念正在嵌入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惯例中,并逐渐发展出透明性方法与技术(涂凌波、张天放,2022)。针对数字传播语境的新挑战,学界重新阐释和再定义“新闻真实”这一经典的规范性理念,对新闻专业化和数字新闻“再专业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王辰瑶,2021)。

3. 使用理论与方法的差异

根据中英文论文摘要中提及的理论和方法概念,我们可以直观地对比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方法的科学性。如图4所示,中文语境下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论文明确提及使用具体的理论视角或理论模型的比例为16%,“部分”使用理论,即没有明确说明基于特定理论框架但涉及或隐含相关理论概念的文章比例为43%;而在英文论文中,使用理论的比例为27%,部分使用理论的比例却低于中国学者的论文,比例为24%。中英文论文在没有使用任何理论这个情况下基本趋同,中文论文中没有使用理论的比例(41%)甚至低于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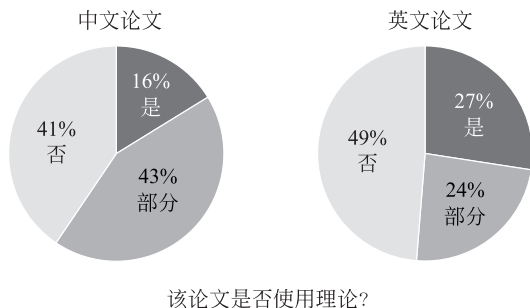


图4 数字新闻学中英文论文理论显性分布及对比

论文(49%)。

由此可见,中国数字新闻学研究虽然在“新闻理论”议题上显露出浓厚的研究兴趣,但在论述逻辑上更偏向于思辨性而非中层社会理论,而且倾向于使用具有复杂理论背景的学术概念,比如“新闻真实”“技术可供性”“新闻生态”。经人工编码和筛查,我们发现中国学者更关注数字新闻学的规范理论(如新闻价值、新闻权威、新闻客观性),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关理论视角(如物质性、可供性、行动者网络);同时还涉及新闻叙事文本和语言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如叙事理论、话语理论、元话语理论。而欧美数字新闻学研究者尽管对“纯粹”新闻理论研究的关注度很低(仅有8篇),但在研究(摘要)中明确提及使用到的具体理论或模型的较多(占比27%),且多于隐性使用理论或仅使用概念的研究(占比24%)。这些理论包括较多传播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经典中层理论,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场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选择性接触理论。

在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见图5),中文论文中明确使用的研究方法涉及定性方法(占比20%)、定量方法(占比3%)、混合方法(占比2%)和计算方法(占比1%),但有74%的研究论文没有清晰地采纳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取向。相比之下,英文论文科学性和方法意识更强,将近一半(占比47%)的论文采用了定性方法进行研究,超过四分之一(占比28%)的研究使用定量方法,使用混合方法的比例则为7%,略高于在新闻学领域仍未被广泛使用的计算方法(占比5%),而无研究方法的论文仅占比13%^③。由此可见,基于深度访谈、话语分析、对话分析和扎根理论等的定性/质化方法仍然是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路径,这与前人的文献综述的结果一致(Steensen & Ahva, 2014)。中外研究者均倾向于对数字新闻现象或对象内在规定性进行整体性探究,从观察、对话和参与过程中获取的经验材料中形成抽象概念和理论,经由与新闻行动者及其内容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阐释性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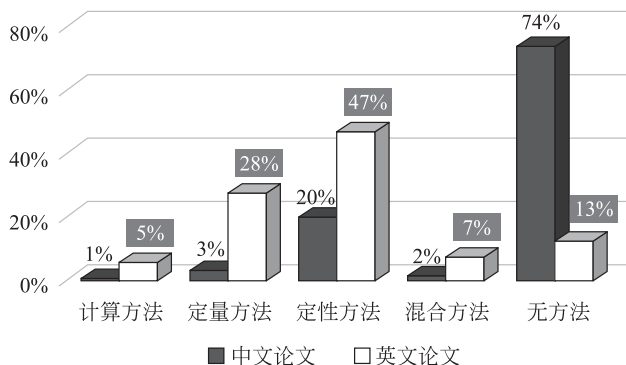


图5 数字新闻学中英文论文研究方法分布及对比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近五年(2020—2024)中外数字新闻学文献元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和知识梳理,从学科视角、研究议题、理论和方法等维度描摹该领域全球性研究趋势中的多样性现状以及中西比较语境下理论发展的路径差异。不难发现,经历诞生初期的“野蛮生长”和“狂飙突进”之后,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逐渐复归理性,对多元学科视角和研究议程展现出更鲜明的包容性和对话性;但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新闻学作为创新范式的建制化和主流化,支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传统权力结构也变得更为强大,数字新闻学理论成长的核心议题须由“追求发展”尽快转变为“追求均衡”。在此历史转折点上回望,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当前数字新闻学知识生产的全球版图和知识体系的演进方向,并据此凝练数字新闻学发展的中西差异和在地化特征。

首先,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新兴学科范式,数字新闻学近五年来在国家多样性、跨学科多样性和议题多样性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但仍维持着以全球北方为中心的知识版图。总体上,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已形成以全球北方(欧美为主)为中心、以全球南方(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主)为边缘的不均衡知识体系。然而,身处边缘节点上的数字新闻经验与观念却与中心保持着观察与思考角度的某种一致性。例如,在非西方国家政治和文化情境中,研究者同样关注数字技术与传统新闻教育、实践及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一致性可能是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和可见性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也可能缘于建立在相似技术标准之上的新闻数字化转型逻辑的某种全球同构性。中国学者不断进入国际学术场域并持续贡献中国经验,为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均质化引入了异质性和特殊经验,例如由国家和政治驱动的数字新闻创新模式,对西方语境下典型的“技术—市场—用户”解释模型作出了有益的拓展。

其次,全球数字新闻学研究资源分布的西方中心主义结构直接影响着该领域学科视野的转换与研究议题的集中化。作为对经典范式进行破坏性发展的创新范式,欧美数字新闻学在理论资源吸纳和方法取向上大体维持着跨学科的西方学术传统(Zelizer, 2004)。这不但印证了十年前文献观察的结论(Steensen & Ahva, 2014),而且其趋势仍在继续放大。欧美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发展因循一条更倚重社会学的路径,后者对权力、控制、结构、制度和社区等问题的关注延续了媒介社会学范式在数字时代的更新;基于“社会—技术”框架的话语权力正在形成,与关注新闻业转型和消费者转向的经济学视角一同持续渗透数字新闻学的理论根基;而针对新闻实践的数字文化、职业文化和其他情境性因素的文化分析也在形塑该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断强化数字新闻学理

论的解释学色彩。在研究议程方面,“新闻实践/生产”“新闻受众/消费”“新闻产业”和“新闻分发/流通”“新闻内容”等议题占据了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心,反映了数字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一脉相承的核心对象,即趋向于解释“权力”“行动者”“金钱”和“事实”相关的问题,并对民主生活的健康运作怀有深刻的规范性关切(Reese, 2017)。

再次,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展现出浓重的理论思辨性以及对于知识体系进行重建的学科意识,并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中心导向的“问题域”。受美国主流新闻学研究的路径依赖影响,欧美数字新闻学学术话语充满了对时下技术变迁、分发革命、受众流失和信息失序等议题的焦虑情绪和危机感,以致西方学者普遍发出“前景黯淡”的感慨。相较而言,中国数字新闻学的知识生产更偏重哲学视角和理论议题,展露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独立性”,这既源于中国本土学术哲学思辨和道德规训的传统,也源于国家体制所决定的新闻媒体改革和转型发展的路径独特性(常江、黄文森, 2021)。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新闻学学科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发问逻辑,并致力于就三个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结构性预设做出回应:其一,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变革是生态性的,新闻(业)的形式和本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二,多元新闻行动者在数字媒体生态中保持着复杂的动态关系,他们在流动的实践标准和专业规范中不断确认并积极塑造着自己的身份;其三,技术的迅猛进化决定了新闻业将面临持续乃至恒久的价值和伦理危机,数字新闻学范式应致力于对民主和公共性理念的革新。

最后,与欧美学界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论化偏好不同,中国数字新闻学更加注重从技术驱动的创新实践中形成伦理和价值层面的规范理论,而方法路径选择上的数据思维和科学性仍有待提升。欧美数字新闻学保持“重理论、重方法、重解释”的特征,除了以(隐性)扎根理论为主的方法路径之外,还坚持从社会科学的理论传统出发对新现象和新业态做出经验性或实证性的解释。与之相比,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则更具人文主义色彩,在理论化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历史和文化的解释学,倾向于对新闻价值和规范理论的重申和范畴延展。然而中西方对伦理规范的激烈辩论均未转移至对“新闻伦理/法规”实务和应用的探讨,这也是未来数字新闻业(学)的合法性根基及发展前景的忧思所在(Reese, 2017)。总体上,中国学者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效使用和探索性组合的尝试依然不足,其研究方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对计算方法和混合方法的使用可能会拓展数字新闻学想象力的边界(黄文森, 2021)。

诚然,不同国家新闻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根源彼此相异,全球新闻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多样性受当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直接影响,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的稳健性也受制于全球南北方区隔、依附和失衡的资源流通格局。但鉴于

全人类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的相似境遇,中西方数字新闻学的发展还是可以拥有求同存异的巨大对话空间,以及由这一空间所生发和培育的理论团结。人类社会的内在文化多样性并不必然导向误解和排斥,每一个普通人永不止息的对话、交往与融合的愿望是比一切人为政治化的差异更有力量的结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318)的成果之一。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胡特、黄林宇、郑梓健作为编码员参与研究工作,本文作者在此致谢。

注释

- ① 本文中对“学科视角”(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的划分沿用前人研究(Steensen & Ahva,2015)的标准,但实际上“技术”(Technology)和“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不属于专门的学科门类,但为了形成与既有研究的比较和对话,依然保留其对研究领域划分的表述。
- ② 机构所在国家的统计口径以作者人次而非具体人数为准,即对同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的情况不作处理,这样既考虑到作者供职跨国机构或跨国工作流动的可能性,同时以论文为单位考察作者(每一次发表)所代表的国家或文化背景,更能体现学术期刊作为话语资源对其可见性和代表性的影响。
- ③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基于人工编码的统计结果,并不能排除该论文在摘要中未明确提及理论或方法而在正文中提及的情况,但至少表明在中英文论文书写习惯上中外数字新闻研究者对理论/方法的认知和重视程度截然不同。

参考文献

- 白红义、张恬(2021):社会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闻业:场域和生态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第4期,109-132页。
- 常江(2020):数字新闻学:一种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新闻记者》,第2期,12-20,31页。
- 常江(2021):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实然、应然和概念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28卷第9期,39-54,126-127页。
- 常江、黄文森(2021):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演进与中西比较,《新闻记者》,第8期,13-27页。
- 常江、刘璇(2021):数字新闻的公共性之辩:表现、症结与反思,《全球传媒学刊》,第8卷第5期,93-109页。

- 常江、杨惠涵(2023): 生态修复: 数字时代新闻权威的构成与构建,《新闻与写作》,第7期,5-15页。
- 陈昌凤(2023):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 实务赋能、理念挑战与角色重塑,《新闻界》,第6期,4-12页。
- 陈凯宁(2024): 附身的技术: “可穿戴新闻”的生命数据与生活叙事,《新闻界》,第5期,23-34,45页。
- 何天平(2023): 数字新闻叙事的结构、话语和文化研究,《新闻大学》,第1期,28-38,119页。
- 黄文森(2021): 计算方法在数字新闻学中的应用: 现状、反思与前景,《新闻界》,第5期,13-22页。
- 黄文森、常江(2024): 何谓另类媒体? ——媒介技术史视角的解读,《新闻记者》,第3期,27-41页。
- 黄雅兰、罗雅琴(2021): 可供性与认识论: 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创新,《新闻界》,第10期,13-20,32页。
- 黄雅兰(2024): “指示器”与“助推器”: 可供性概念在数字新闻学中的应用与反思,《新闻界》,第7期,26-35页。
- 李艳红(2024): 专业何以正当化: 再论新闻权威概念,《新闻界》,第3期,28-37页。
- 李玉媛、余文斌(2022): 数字新闻学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视角,《新闻界》,第7期,4-11,23页。
- 梁君健、杜珂(2022): Vlog 新闻: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创新与观念挑战,《中国出版》,第4期,3-9页。
- 刘松吟(2024): “行动者网络”之后: 数字新闻研究中的行动者转向与再定位,《新闻界》,第10期,28-37页。
- 迈克尔·舒德森、克里斯·安德森(2022): 新闻的基本观念: 历史缘起与中西比较(常江、王润泽译),《新闻记者》,第8期,3-14,33页。
- 庞华、张凯歌(2024): 由技术想象迈向关系技术: 虚拟机器人嵌入数字新闻生态的在地实践与情感唤醒,《中国出版》第20期,10-17页。
- 彭剑、江浩(2023): “新闻权威”的理论起源、意涵演进与研究延展——一个经典理论的概念史考察,《新闻与写作》,第1期,47-56页。
- 彭兰(2022):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新闻界》,第1期,5-14,84页。
- 仇筠茜(2021): 信息生态设计者: 数字新闻治理的第三种规范性站位,《新闻界》,第12期,69-78页。
- 申爽(2024): 新闻物质性的理论脉络、内在逻辑及其反思——一项知识系谱学考察,《当代传播》,第3期,49-54页。
- 田浩(2024): 重估“情感公众”: 用户行动与数字新闻研究的链路拓展,《新闻界》,第6期,13-21页。

- 涂凌波、张天放(2022):数字时代如何理解新闻透明性?,《全球传媒学刊》,第9卷第1期,146-162页。
- 王辰瑶(2021):“新闻真实”为什么重要?——重思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古老的新闻问题”,《新闻界》,第8期,4-11,20页。
- 王晓培(2024):介入与纾困:开放生产与新闻业社会角色变迁,《中国出版》,第14期,18-24页。
- 向芬、余越(2024):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的聚合——基于“新闻报道剧”的考察,《国际新闻界》,第46卷第8期,132-150页。
- 肖燕雄、郭妍(2023):“空间新闻学”的兴起及数字新闻的空间建构——以2022年度Sigma Awards入围作品为例,《新闻界》,第4期,21-33,46页。
- 徐笛、许芯蕾、陈铭(2022):数字新闻生产协同网络:如何生成、如何联结,《新闻与写作》,第3期,15-23页。
- 杨奇光、苏娟(2023):容积捕获:数字新闻的立体景观、六度自由与索麻困境,《新闻记者》,第5期,16-25页。
- 张伦(2023):作为实践的开源新闻生产:概念、特征与反思,《新闻界》,第12期,13-20,35页。
- 赵家琦(2023):公私情界:数字新闻的情感交往与规范重构,《新闻界》,第4期,62-69页。
- Agirre-Maiora, A., Murua-Uria, I. & Zabalondo-Loidi, B. (2020). Tight business models for slow journalism projects: Economic subsistence of slow media outlets.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29(6), e290620. doi: 10.3145/epi.2020.nov.20.
- Allan, S. & Peters, C. (2020). The visual citizen in a digital news landscape. *Communication Theory*, 30(2), 149-168. doi: 10.1093/ct/qtz028.
- Breit, R. (2020). Case-based education: A strategy for contextualising journalism curriculum in East Africa. *Journalism*, 21(12), 1985-2005. doi: 10.1177/1464884918761629.
- Carlson, M. (2020).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 and digital news circulation: Infrastructure, circulation practices, and epistemic contests. *New Media & Society*, 22(2), 230-246. doi: 10.1177/1461444819856921.
- Chan, C. K., Lee, F. L. F. & Tang, G. (2024). News innovation under rapid political change: Influence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ritical events. *Journalism Practice*, 1-18. doi: 10.1080/17512786.2024.2370478.
- Estella, P. G. (2021). Digital populism, digital newswork and th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competence: The Philippine condition.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 179(1), 80-95. doi: 10.1177/1329878X211003568.
- Fang, K. C. & Repnikova, M. (2022). The state-preneurship model of digital journalism innovation: Cases from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7(2), 497-517. doi: 10.1177/1940161221991779.
- González-Bailón, S. & Xenos, M. A. (2023). The blind spots of measuring online news exposure: A comparison of self-reported and observational data in nine countr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6(10), 2088-2106. doi: 10.1080/1369118X.2022.2072750.
- Hagar, N., Wachs, J. & Horvát, E. Á. (2023). Writer movements between news outlets reflec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25(8), 2034-2056. doi: 10.1177/14614448211027173.
- Ilan, J. (2022). Live and kicking: Digital live broadcasting technologies, participating strangers and news mo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2325-2344.
- Ivanov, A. O. (2020). Evaluative practices in a broadcasting newsroom archive: Culture, con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 2887-2904.
- Lelo, T. (2024). Fost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face misinformation: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automated fact-checking in Brazil.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01(2), 320-345. doi: 10.1177/10776990231207963.
- Lindell, J. & Mikkelsen Båge, E. (2023). Disconnecting from digital news: News avoidance and the ignored role of social class. *Journalism*, 24(9), 1980-1997. doi: 10.1177/14648849221085389.
- Lischka, J. A. & Garz, M. (2023). Clickbait news and algorithmic curation: A game theory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journalism, users, and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5(8), 2073-2094. doi: 10.1177/14614448211027174.
- Lor, Z., Oh, H. J., & Choi, J. (2023). Excluding and including: News tailoring strategies in an era of news overload. *Digital Journalism*, 11(6), 943-961. doi: 10.1080/21670811.2022.2048187.
- Mañas-Viniegra, L., Veloso, A. I. & Sierra-Sánchez, J. (2020). Immersive content with violence: A research using eye tracking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pain and Portugal.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29(1), e290108. doi: 10.3145/epi.2020.ene.08.
- Mangold, F., & Scharkow, M. (2022). Metrics of news audience polarization: Same or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16(3), 157-181. doi: 10.1080/19312458.2022.2085249.

- Marino-Jiménez, M., Flores-Núñez, A. M., Rojas-Noa, F. O. & Vásquez-Espinoza, P. (2023). Independent journalism for hybrid democracies: A systemic vision in thre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0. doi: 10.1080/17512786.2023.2279341.
- McAdam, A., & Hess, K. (2024). Outdated or innovative? Examining news practice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t one of Australia's longest-serving local newspaper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92(1), 21-33.
- Meng, J. & Wang, H. Y. (2025). Performing transparency in vlog news: Self-disclosure of Chinese journalists in vlog reporting on COVID-19. *Journalism Practice*, 19(1), 134-150. doi: 10.1080/17512786.2023.2169189.
- Moreno-Moreno, E., & Sanjurjo-San-Martin, E. L. (2020). Selective consumption of news brands in Spain: Trust, political leaning, and degree of digital consumption.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29(5). doi: <https://doi.org/10.3145/epi.2020.sep.24>.
- Munoriyarwa, A. & Chibuwe, A. (2022). Journalism beyond the coup: Emerging forms of digital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post-coup Zimbabwe. *Digital Journalism*, 10(7), 1198-1218. doi: 10.1080/21670811.2021.1957966.
- Nelson, J. L., & Lewis, S. C. (2022). The structures that shape news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ism*, 23(12), 2495-2512. doi: 10.1177/14648849221095335.
- Opgenhaffen, M. & Hendrickx, J. (2024). Social media news editors as journalists or marketeers: Who are they and how do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Journalism*, 25(6), 1383-1400. doi: 10.1177/14648849231167282.
- Pantic, M. (2022). Local media in a digital market: Establishing niche and promoting original reporting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Journalism Practice*, 16(8), 1736-1752. doi: 10.1080/17512786.2021.1874483.
- Perreault, G. P. & Ferrucci, P. (2020).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Defining the practice and role of the digital journalist. *Digital Journalism*, 8(10), 1298-1316. doi: 10.1080/21670811.2020.1848442.
- Quandt, T. (2024). Euphoria, disillusionment and fear: Twenty-five years of digital journalism (research). *Journalism*, 25(5), 1186-1203. doi: 10.1177/14648849231192789.
- Rauchfleisch, A., Vogler, D. & Eisenegger, M. (2020). Transnational news sharing on social media: Measuring and analysing Twitter news media repertoir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udience communities. *Digital Journalism*, 8(9), 1206-1230. doi: 10.1080/21670811.2020.1835511.

- Reese, S. (2017). The journalistic imagination and the future of research. In Rupar, V. (Ed.), *Themes and Critical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pp. 139-149).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 Ren, R. Q. & Xu, J. (2024). It's not an encyclopedia, it's a market of agendas: Decentralized agenda networks between Wikipedia and global news media from 2015 to 2020. *New Media & Society*, 26(11), 6235-6259. doi: 10.1177/14614448221149641.
- Royal, C. & Kosterich, A. (2024). Coding competencies across roles: Computer programming practices in news media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25(7), 738-758. doi: 10.1080/1461670X.2024.2340570.
- Salaverria, R. & Martínez-Costa, M. D. P. (2024). Digital journalism in Spain: Technological,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s drivers of media evolution. *Journalism*, 25(5), 1050-1069. doi: 10.1177/14648849231170519.
- Sjøvaag, H., Ferrer-Conill, R. & Olsen, R. K. (2024). Capture beyond the platforms: The material and infrastructural conditions for digital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20. doi: 10.1080/21670811.2024.2377078.
- Steensen, S., Grøndahl Larsen, A. M., Hågvar, Y. B., & Fonn, B. K. (2019) What doe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look like?. *Digital Journalism*, 7: 3, 320-342, doi: 10.1080/21670811.2019.1581071.
- Steensen, S., & Ahva, L. (2014).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An exploration and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9(1), 1-18. doi: 10.1080/17512786.2014.928454.
- Steensen, S., & Westlund, O. (2021).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enenboim, O. (2023). Media production logics in triple-party news-spaces: A five-dimensional framework. *Digital Journalism*, 11(7), 1250-1269. doi: 10.1080/21670811.2022.2105244.
-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Zeng, J. & Chan, C. (2023) Envisioning a more inclusive future for digital journalism: A diversity audit of journalism studies (2013—2021). *Digital Journalism*, 11: 4, 609-629, doi: 10.1080/21670811.2023.2182803.

What i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Global Contexts and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s

Jiang Chang^{1,2}, Wensen Huang^{1,3}

(1.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 Shenzhen University;

3. Center for Global Convergent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ntent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metadata of 575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DJS) papers published in cutting-edge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s from 2020 to 2024, aiming to depict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topics, theoretical concepts,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e knowledge map and evolving trends of global DJS a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nd qualitatively described, and the academic strategies and local practices of Chinese DJS are scrutinized from a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global DJS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national, disciplinary, and topic diversities. However, a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still haunting the field, with Western centralism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Chinese DJS manifests a speculative feature and a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forming theoretical premises and problematic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rich in conceptual and normative resources, Chinese DJS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developing its empirical repertoire and methodological scientificity.

Key Words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News; Journalism Theory;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Knowledge Systems